

# 论“一国两制”构想的科学依据

梅 荣 政

**作者** 梅荣政, 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武汉, 430072

**关键词** 邓小平 “一国两制” 科学依据

**提 要** 关于“一国两制”构想的依据, 国内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见解。本文针对这些见解,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一国两制”构想的科学依据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一切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 植根于物质生产和民族文化的丰厚沃土; 与世界历史发展总进程中的特殊规律相契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 1997年 7月 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 这块中国的神圣领土, 在遭受殖民主义百余年屈辱之后胜利地回归祖国。这是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胜利。在中华民族圆满地写下 20世纪 90年代这辉煌一页的时候, 我们来进一步探讨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科学依据是很有意义的。这里, 我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研究:

## 一、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邓小平曾指出: “一国两制”构想“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sup>①</sup> “一国两制”构想首先是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马克思曾明确地指出过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的对立: “在黑格尔看来, 思维过程, 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 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 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 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sup>②</sup> 这表明“观察的客观性”<sup>③</sup>, 即从实际出发, 是唯物辩证法的内在要求。但由于政治问题集中地直接地反映着人们的利害关系, 在认识、判断和处理政治问题时要做到从实际出发很不容易。列宁在扩展和发挥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时, 曾从认识的来源和出发点上揭示出认识论上的两条基本路线的对立: “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 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sup>④</sup> 这种对立, 在政治生活领域往往表现得更为尖锐。其具体表现为, 解决政治问题是从权力人物的意志愿望、政治情绪出发, 还是从历史的现实的事实出发? 这从马

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看来,“实事”是“求是”的前提和基础,“政治是千百万人的实际命运”<sup>⑤</sup>,对待政治问题,更应该从实际出发。然而,“问题在理论上的解决和实际的贯彻是有区别的。”<sup>⑥</sup>具体就解决香港、澳门、台湾的问题来说,这是最容易触动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因为香港问题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国凭借武力逼迫腐败的清政府先后签订的《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等三个不平等条约的产物;澳门问题亦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葡萄牙殖民者在事实上侵占了澳门地区,于1887年逼迫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了两个不平等条约带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台湾问题虽与港、澳问题的性质不同,属于中国的内政,但台湾与大陆的对峙、隔绝,却是由于美国支持国民党残部盘踞台湾所造成的。因此,在港、澳、台问题上,中国人的确很容易从自己曾经受侵略受歧视的记忆中和受敌视受威胁的强烈感受中去认识和处理问题。邓小平曾经说过,“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的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sup>⑦</sup>他还说:“凡是中华儿女,不管穿什么服装,不管是什么立场,起码都有中华民族的自豪感。”<sup>⑧</sup>这充分表达了一位伟大爱国主义者的热忱。但是,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在从战略上思考如何解决港澳台问题时,并没有因为坚定地“站在我们民族的立场”<sup>⑨</sup>就用感情代替科学,而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贯彻到底,从实际出发作出了“一国两制”的重大决策。这是他作为历史伟人在政治智慧上高于常人之处。关于这点他曾清楚地指出:“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的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sup>⑩</sup>。

贯彻“观察的客观性”原则,要求认识事物要抓住本质,按列宁的话说,“即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sup>⑪</sup>,因为“实例”、“枝节之论”是靠不住的。列宁曾批评说:“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他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sup>⑫</sup>邓小平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战略家,他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不是从个别枝节之论、实例出发的,而是从对历史的和现实的、时代的和国情的全面分析中,抓住那些最本质、最具有全局意义的“实际”作出政治设计的。这就是:

(1) 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尽可能采用和平方式、避免用战争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是人心所向,时代潮流。邓小平依据对世界状况、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发展变化新的观察和判断,断定新的国际背景为用“一国两制”构想解决祖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和平统一提供了可能性(特别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尽管美国还经常制造一些麻烦,干涉中国内政,但总的说来是消除了台湾与祖国大陆统一道路上的一大障碍),而实行“一国两制”还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应,“为世界各国提供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sup>⑬</sup>。同时,这也有利于我国抓住时机,发展自己。

(2) 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我国近代史上两个基本问题(民族独立和工业化、现代化)有关的斗争还继续存在。一方面,香港、澳门、台湾问题滞留至今,本身就说明民族独立与解放问题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最后彻底地解决。在中国领土台湾、西藏等问题上,美国的某些政治势力千方百计地干涉中国内政,不断制造麻烦和事端,妄图“西化”、“分化”中国,使中国沦为国际资本主义的附庸。在香港问题上,英国的一些政治势力也想竭力保持其

殖民统治地位，在中英谈判中曾坚持所谓“历史上的条约按国际法仍然有效”，在归属和主权问题上长期不肯让步。经济不断增强的日本，也不甘心于经济大国的地位，欲当政治大国，军国主义日趋嚣张。这种现实提示我们，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人民仍有继续维护民族的大局和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不受外敌侵犯的任务。解决港澳台问题同这一任务密切相联。就台湾来说，若“不实现同大陆的统一，台湾作为中国的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会被别人拿去。现在国际上有好多人都想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一旦台湾和大陆统一了，哪怕它实行的制度等等一切都不变，但是形势就稳定了。”<sup>④</sup>至于实现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任务更是任重而道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的第二次革命，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改革经济体制和其它方面的体制，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使中国由不发达的国家变成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此，就需要和平与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需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国内外、海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解决港澳台问题必须有利于这个大局。另一方面，近代史上两个基本问题如今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就民族独立而言，社会主义中国早已改变了旧中国与世界列强的关系，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任何国家都不能漠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华民族已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国家工业化、现代化来说，中国早已建立起完整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小康已经在望，它的实力已为世界注目。这又为“一国两制”的提出并付诸实践提供了物质基础。邓小平在谈到香港问题谈判成功时明确指出：“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判成功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sup>⑤</sup>另外，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还不够完善和成熟，既然在整个大陆地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那么，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在国家主体大陆地区实行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亦将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

(3) 港澳台地区长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些年来，台湾已发展成为国际著名的金融中心和自由港。香港同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商品经济，是世界金融中心，也是亚洲工商贸易的重要中心，我国重要进出口岸，在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港澳台人民盼望祖国统一，但由于长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对大陆的政治经济制度了解不够，疑虑甚多，普遍希望保留那里现有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降低现有生活水平。解决港澳台问题必须正视现实。就解决香港问题而言，必须考虑香港的实际情况、中国和英国的实际情况。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若不是这样，坚持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能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即使不发生武装冲突，香港也会成为一个后遗症很多的、非我们希望的香港。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办法只能是“一国两制”，即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其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台湾、澳门的问题也是如此。

## 二、一切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

从共产党的根本立场和最终目标说，我们坚信“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

代替资本主义”<sup>⑥</sup>；但若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刻底蕴——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来思考，就不难把握“一国两制”论的根本出发点。这就是：港澳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港澳台同胞同大陆各族人民一起结成了中华民族这个稳定的共同体，共同铸造了自己的民族特点，创造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形成了活现在世代中国人身上的中华民族魂。实现祖国统一，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共同愿望所在，是中华民族魂之所系。特别是今天在西方大国欲“分化”我国的国际背景下，促进祖国早日统一，更具有迫切的意义。邓小平正是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种主张不仅易为港澳台地区所接受，有利于祖国统一的早日实现，因之有力地抵制了西方大国欲分化我国的图谋，维护了我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这正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且将使港澳台地区的物质文化财富受到很好保护，未来的繁荣与稳定得到可靠保证。显然，这将是整个中华民族之大幸。邓小平在说明这个问题时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sup>⑦</sup>。

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也就是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出发，因为人民正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和脊梁，是伟大祖国历史与文化的创造者。江泽民在评价邓小平时曾指出：“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sup>⑧</sup>关于这一点，邓小平也讲得明白。他说，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没有一点勇气是不行的，“这个勇气来自人民的拥护”<sup>⑨</sup>。他在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见时曾指出：如果中国在1997年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待”，“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sup>⑩</sup>这些都反映出，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对全中国人民负责，是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立足点。

### 三、深深植根于物质生产和民族文化的丰厚沃土

在我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两制”在统一的祖国内共存还有深厚的客观基础。这就是：

(1) 物质生产方面。这主要包括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共性。就社会化大生产而言，虽然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的发展水平存在差距，但总体说来，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是相同的。就商品经济而言，虽然大陆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港澳台地区实行的是资本主义，二者在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宏观调控等方面各有其特殊性，彼此在发展程度上亦不同。但二者作为物质生产发展的一种经济形式，仍都具有商品经济的一般性，如都要受价值规律的调节，都具有基本相同的市场机制和企业经营机制，都具有追求价值、实现本位经济利益、商品当事人生产经营自主、竞争和开放等特征。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历史的出发点和基础。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包括政治关系在内的社会关系发展的根源。即：“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自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sup>⑪</sup>。大陆和港澳台地区存在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共性，是现阶段“一国两制”可行性的重要基础。当然，这个话不能倒过来说，即凡是具有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共性的地区都可以构成一个国家。这里

有一个生产资料所有制形态本身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和因历史主体的创造活动而产生的历史选择性问题。这里只是说，从现实出发，在一国之内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一定时期共存和共同发展，因为有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共性——对立中的同一，而具有一定的客观基础。在这里，真理向前迈出半步就会成为谬误。

(2) 民族文化方面。这里讲的民族文化是广义的，它包括在一定民族经济发展基础上产生的民族传统、生活风尚、民族语言、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民族感情和文学艺术等等。如前所述，港澳台同胞同大陆各族人民在长期的、日益加强的经济文化联系中，在历史上结成了中华民族这个稳定的共同体，创造出光辉灿烂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些物质的、精神的文化已转化为中华民族的强大生命力和伟大的向心力及凝聚力。许多西方人不明白，为什么在5000多年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大的长时间的分裂仅600年左右，加上短时间的局部分裂，分裂时间总共也不超过1/3，而且越靠近近现代，出现分裂的时间越短，统一的时间越长；为什么近300余年间，台湾曾三次与祖国大陆分裂，又三次和祖国大陆统一？为什么每当中国遭到外强入侵时，中国各族人民总是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奋起反抗侵略者？原因当然可以列举多个方面，但首要之点在于，有共同的民族文化、民族感情、民族意志凝聚着炎黄子孙。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讲得很深刻：“这首先是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sup>⑧</sup>。正是这种历数千年而不衰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成为把各族人民凝聚在中华民族旗帜下的伟大政治力量。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就是建立在这种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基础上的。

#### 四、与历史发展总进程中的特殊规律相契合

“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从中国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又与世界历史发展总进程中的特殊规律相契合。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进程中，既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又有其特殊性的规律。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以此为前提。我们在这里说的特殊历史规律，是指人们清楚地看到一种常见现象，即两种或两种以上性质的社会形态在一定历史时期并存于一国之内。如1861年后的俄国、南北战争前的美国、新中国建立前都存在过这种现象。其原因是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进程中，由一些具体国家或民族内部的特殊矛盾所引起，在社会形态的发展上出现了时间上的非同步性，这种非同步性展开在空间上表现为多元性。当然，这里讲的自然历史过程中的现象的成因、性质及结局，与“一国两制”作为历史主体的杰出的历史创作不尽相同，但前者作为业已存在的现象毕竟可以为前者提供历史论证。再者，前后相继的两种社会形态在一国之内的革新取代，也因为质变实现了决定其性质的主体部分变革以后，处于次导地位的旧的社会形态的残存部分往往不会立即消失，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这一过程中，新旧社会的革新取代，就不会“非此即彼”，以单线进化的机械图式进行，而呈现几种形态（占主导地位的和不在主导地位的）在一国内交叉并存的现象。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来，为什么会出现几种社会形态在一国内交叉并存的历史现象呢？

(1) 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必须有自己应有的物质技术基础，没有这种基础，这种社会形态固有的规律就不会充分发生作用。然而，造就这种物质技术基础，却是一个客观的物质变

换过程,即对于该社会形态来说,从异己的物质技术基础到创造出适应它自身要求的物质技术基础,这是一个从旧质过渡到新质的量的积累过程。与此相适应,新社会取代旧社会,往往出现新旧社会的革新取代和交叉并存现象。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类的“‘解放’是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的状况促成的。”<sup>⑧</sup>这表明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进程中合乎规律的现象,基于客观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它需要有一个公有制逐步取代私有制的历史过程,其时间长短只能依各国、各民族的具体条件而定。现在我们在大陆地区实行社会主义,在局部的、小范围的、次要的地区保持完整的资本主义制度,归根到底是由物质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

(2) 任何一个国家总是历史形成的。从地理上说,构成一个国家的各个不同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程度往往是很不相同的,特别是在一个大国范围内。既然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体系最终由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那么由于各地区生产力发展程度上的不同,就不仅会使同一社会关系有发展成熟程度的不同,而且还使不同质的社会关系的存在有了客观的基础。

(3) 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产生以后,还受社会的思想文化状况的影响。新的思想文化发展不足以会制约新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旧的思想文化的相对独立的存在发展,既制约新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程度,也会延续旧的社会形态残存部分的生命。

(4) 埋葬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社会革命的深刻程度也直接影响新旧社会的革新取代与交叉并存。社会革命越深刻,留下的旧的社会残存部分就越小。

在一个国家内,几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交叉并存,为处于低级阶段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和选择性。因为由于“隔代高级社会”与之交往、牵引,比单纯由低级社会自己创造的生产力及相应的文化能够更好地满足它发展的需要<sup>⑨</sup>。所有这些客观存在,为“一国两制”构想提供了社会历史依据。

#### 注 释:

①⑧⑨⑩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1、60、75、68、219-220、85、382-383、59、19、12、13、17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1-112页。

③④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11、37、411页。

⑤⑥ 《列宁全集》第5卷,第322、79页。

⑦ 邓小平:《邓小平副主席文集》序言,《党的文献》1997年第2期,第3页。

⑫ 《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

⑬ 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3卷报告会上的讲话》(1993年1月2日),见人民日报1993年11月4日。

⑭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7页。

⑮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

⑯ 参见李延明《牵引超越原理》,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5年第2期。